

吾愛真理 吾更愛吾師

文/周祝瑛(政大教育系教授)

內地教育研究為中國研究之一環，而美國又是中國研究領域中發展較早，且各地人才匯聚的國家。根據維吉尼亞大學何漢理教授 (Harry Harding)與筆者早年的研究，美國中國研究發展可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一、一九六〇年代，由於美國二戰後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各種基金會對第三世界研究的資金投入，促成美國由傳統的漢學走向中國研究。此時期的重點，多以中共建政對中國社會衝擊等為課題。

二、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經歷越戰與目睹內地文革的發生，美國學者改採用批判等理論，從整體中國社會結構等觀察，轉向對城鄉社會個案的研究方向，套用各種研究模式，如：趨勢、利益團體與派系等架構，來分析中國的政治變化。

三、一九八〇年代，受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影響，美國研究人員得以進入中國做調研，可以更詳細、複雜且深入的從事田野調查，但多數研究者仍難以掌握中國的整體發展。

四、一九九〇年代迄今，綜合過去研究經驗，美國學者從以往必須借用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等研究途徑，轉而對中國環境發展變化建立出特有的分析模式，彌補過去太重視經驗法則的取向，期能真正掌握中國整體結構與變化趨勢。此外，加上這個時期大批留美中國學生，畢業後進入全美各學術機構工作，使得該領域加入這群通曉中文、了解中國文化與社會脈絡，且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華人知識精英，為這個時期中國研究打造美國整體能量。

只是上述這些中國通也隨着時代演進，而面臨世代交替的命運。其中，二〇二〇年六月七日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中國教育研究專家約翰·霍金斯教授(John N. Hawkins, 1944–2020)與世長辭。由於當時正逢美國新冠疫情的最高峰，上述消息幾個月後才陸續傳開，讓散居全球各地的學生們聞之哀痛逾恆，痛失這位摯愛的導師。

UCLA曾是美國中國研究的重鎮之一，長期擔任該校國際事務部主任的霍金斯教授，生前致力於該校與東亞地區的學術交流，且早於一九八〇年中期即陸續接受與協助無數來自兩岸四地的留學生與訪問學者，指導博碩士論文。退休後更透過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的資深學者論壇，推動與亞洲及中國的各種學術交流與合作課題。他是一位見證過中美近半世紀以來關係發展，融合了學術研究與生命故事於一身的西方學者。

霍金斯年輕時曾與中國傳奇相遇，在文革初期因緣際會造訪許多內地城市，親眼目睹當時的各種社會運動，成為當時少數造訪中國的外國人士。返回美國後，遭安全人員扣留護照期間，進大學深造，完成與中國有關的博士論文，並於一九七四年出版“毛澤東教育思想”專書，封面印有獲毛澤東接見的合照，成為當年美國唯一的著作，開啟日後持續在中國教育領域的精彩學術生涯；擔任美國核心期刊比較教育評論主編。更在UCLA任教三十多年，其門徒遍及世界各處學界與政界等。UCLA更成為美國西岸中國研究的重鎮之一。

霍金斯出生於美國二戰世代，成長於一九六〇人權運動年代，親眼經歷反越戰風潮。曾目睹文革與日後中國經濟等各方面的快速成長，也十分關注台灣的發展，認為華人社會因文化傳承、交流與創新而獨具特色。他也推薦美國重要出版社，出版台灣教育等相關專書。霍金斯退休後更不辭辛勞，每年飛來亞洲參加培訓講座，邀請各地門生，參與國際合作計劃。這位退而不休的國際學者，在某次國際會議的開幕致詞中，可能因旅途勞累，報告到一半即出現身體不適情況，送醫復健後依然不幸離世，令人不捨。但身為門生都知道：霍金斯教授是在以生命見證對學術的熱愛：活着的時候在杏壇發光發熱，臨走前也不忘在講台上鞠躬盡瘁，樹立典範。

從美國二戰後中國通的相繼辭世，新的世代交替正逐步展開中。這些與霍金斯教授同世代的學者陸續凋零，固然令人感嘆，但他們身後留下的學術風範，正隨着他們的學生，散佈世界各角落。

畢竟，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原文網址: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1-05/31/content_1519701.htm